

INTERVIEW TRANSCRIPT

徐坦访谈

访问：翁子健

日期：2007年10月28日

时间：约1小时

地点：珠海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广州美术学院

问：最初为什么会到广州来读书？

坦：最早读本科时，是因为七十年代广东艺术在中国很有名。七十年代有很多广东的青年画家，在全国美展上兴起了热潮，他们画的画样式很新，受印象派的影响。我在老家已经知道广东的油画很新的一种，也很有影响，所以考美院时便考广东了。

问：七十年代已经知道像印象派的艺术？

坦：因为我的父母是美术学院的教师。在小时候已多多少少看过一些关于印象派的讨论。在六十年代，曾经有一段时间出现过印象派的影响，后来也有很多批判印象派的文章，说印象派是资产阶级的艺术。我在很小的时候已经看过像梵高、高更、马奈、莫奈的一些画，但时很少，一两张，也把他们看成一种不正典的艺术。因为我们在学院学画时是学苏联的现实主义艺术，或俄罗斯十九世纪的巡回画派。事实上俄罗斯的巡回画派已经受了法国印象派的影响，特别是像后来的一些画家，他们的用色、用光，基本上都是模仿印象派的原则的。对，但是基本上都是学习苏联的。直到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进入了大量的西方画册。西方画册里可以看到很多的印象派，那时我已经在读美术学院。

问：是在广美吗？

坦：我以前在湖北美术学院待过，湖北美术学院的图书馆也有，也能看到，那是七十年代中期以后，七七年左右才有。到了广州美术学院便有很多这样的画册。

问：具体有什么画册？

坦：(画册)那里有很多，印象派肯定是全部都有。莫奈、马奈、毕沙罗，还有后印象派如塞尚、梵高、高更。而且还有一些更现代的，如保罗·克利、康定斯基，甚至毕加索都有。这些画册是我到广州以后可以看到。

问：这些画册对您的艺术影响大吗？

坦：那影响很大的。看了这些画册才知道这些绘画的观念和它的结果，与我们一直奉行的现实主义作风的观念和作品差别是很大的。不仅有这些，后来也有一些西方现代艺术、美国现代艺术的大画册。七九年，我来美院不久，美国有一位老太太叫科恩夫人，她来过美术学院做讲座。有一种学习西方现代主义的环境，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

问：美院的老师教学与图书馆及讲座的风格是相悖的，何以会有这种现象？

坦：但是图书馆，它是这样的——除了现代的东西，还有很多传统的东西，只是我们不太看它，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时候，七十年代末强调改革开放。邓小平上台后，更强调要搞四个现代化。所以不管学校的老师喜不喜欢现代艺术，这个是现代化的标示，科学要现代化、文化要现代化，那个时候不光有艺术，还有哲学。那个时候学校做讲座，讲沙特的存在主义，同学都热情很高，把整个课室都挤满、窗外都站满了人。八十年代初整个气氛是走向现代，很多东西你不懂、你不喜欢也得进。

问：很多西方现代的哲学引入吗？

坦：对，那个时候已经有存在主义、后来又有海德格、现象学等，最早是实用主义。所谓的现代哲学，是指马克思以后的、黑格尔以后的所有各个流派。比如说八三年我写毕业论文时，是学习了意大利的伯格森(H. Bergson, 1859-1941)的直觉主义，这些跟生命哲学都有关系。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西方思想影响都很强大，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国家在号召现代化。邓小平讲如果落后，这个民族便没有前途。他也不喜欢这个东西，但它也知道(不进步就)不会有前途。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悖论。又知道落后要捱打、要进步，同时进来的东西你又不喜欢的。

问：书是从图书馆看还是买回来看的？

坦：像这种画册是不能买，一般买不到，也很贵，以我们的收入买不到。经常是十几个同学让老师去图书馆借出来，坐在这里看。每星期都要去一次。

问：有没有临摹？

坦：也有，就是用很简单的材料，比如说用水粉画，简单临摹一下。

问：其他的书就是买的多吧。

坦：这个就是要买。那个时候很时兴，在学校里像杨小彦、焦耀明这些同学，我们觉得他们看了很多西方现代的思想、比较深刻。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那时一个学生在学校要是很深刻，看了很多书，看了叔本华、看了尼采这样的哲学，他看了很多萨特，他就会变得很深刻，讲话都不一样。如果你是个男生，便会有很多女生追着你。现在你要是这样，你便是个傻子。这个时代很奇怪，现在要是谁像周星驰那样讲话，便有很多女孩喜欢你。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是要懂得更多的现代知识，大家都要有一种野心。像我们的师兄师姐画都画得很好，我来广美读书是想成为大师的。现在这样跟学生讲，他会觉得很好笑，这不是你能当的，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整个环境感觉有一种机会，因为在这个文化是开放、是一种Push(推动)的。

问：同学之间讨论的话题是什么？

坦：多半是讨论画画、哲学、或者文学这些方面。也会讨论一些和社会有关的话题。谈到跟生活有关的也有，但不一定是主要的。也会有，但(更多是谈些)觉得有意思的、通过谈话能有收获的东西。

问：通过这些谈话您觉得自己受了怎样的影响？

坦：比如说，我在读大学本科时，我跟黄小鹏是一个班的，而且住在同一个房里。我们经常会讨论现代文学，比如是英国诗人艾略特、叶芝的作品，或他看到了什么。另一个同学，也是画画的，现在在北京，叫段正渠，他现在也画得很好。他也经常谈文学，因为他阅读很多、看了很多书。各种现代派的文学当时我们是读得很多的，包括荒诞派、美国的福克纳、意识流、法国的新小说罗拔·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等，都是热门话题。这种交流里大家可以得到一种感性、还有一些观念，这种讨论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我想起我一年级时是很不深刻的，看到一些现在想起来是很愚蠢的东西，我都会感动。后来经过这种讨论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文学、什么是真正的现代派文学、思想和哲学。在大学里同学间的讨论影响思想是很大的。另外没有什么阅历，看的都是中国拍的、现在回头看很搞笑的电影，经过与人讨论之后，你的看法变化很大。

港台文化

问：刚才提到，您后来觉得中国的电影很搞笑，什么时候有这种转变？

坦：那还是在大学里面。那时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社会上的电影都是政治流派的，而且当时进口的一些电影都是比较简单的。基本上对我来说，对文学、哲学的观念转变，对别的方面、比如看电影，便也都转变了。

问：什么时候才有一些不一样的、西方现代的电影进来？

坦：在我们早期时，八十年代时，看电影是不太能看得到的，因为那个时候还没什么盗版。直到了我书读完

了，九十年代才有时候能看到一点点。比如好莱坞的，是那种卡式录像带，从香港带进来的。这样的东西都是九十年代后的事。我后来从事录像艺术这个工作以后，我基本上对电影的兴趣慢慢便很少了。因为我觉得电影艺术无论如何，对我来说始终没有Video Art那样有吸引力。电影艺术始终是One-Channel的Video Art可以有Video Installation等很多种办法，因为我喜欢这种方式。所以电影一直不是我特别能说的。

问：刚才提过卡式录像带是从香港带来的，香港八十年代对广东文化的影响是否很大？

坦：我刚刚开始读广州美院，就已经看到香港文化的影响。最早是歌，当时他们叫「时代曲」，也不叫流行曲，叫时代曲。最早是邓丽君，之后便是香港所有的歌星。我上美院以后，所有房间里都在放各种各样的时代曲。包括黄小鹏，也老是听香港的时代曲，还有六、七十年代美国的流行歌曲。这些东西对我们、对整个环境、气氛都是影响很大的。以前我们的文化、环境、社会都是目的性很强的，就是你做这个到底是为了什么，但是香港文化告诉我们，你做这个就是为了你的生活，你的艺术就为了让你活在这里。我一直认为流行文化影响最大的是香港文化，直到今天我也觉得是这样的。今天有人说韩国，当时也有人说过台湾。始终还是香港文化的影响是最强大的。特别是最近中国文化中所谓的「恶搞」，我觉得都是跟香港的「无厘头」文化有关。

问：有没有通过香港知道一些国际的新闻？

坦：那个不多的，很多是生活杂志、时尚生活的杂志。我们常听香港的电台，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我们当时听的是「商业一台」和「商业二台」。像「商业一台」，我们整天、在每个房间都在唱这个。当时这个是拦不住的了，香港电视现在有些还可以剪，广播是剪不掉的，什么都有。我觉得这个影响很大。我一直认为在广东这里的当代艺术与北方不一样，还是跟这里受香港生活文化环境影响有关系。因为在中国，广东我认为是最自由的地方，是最有自由意识的地方。我现在到北京、上海，那些地方很发达，经济上很时尚，但未必感觉很自由。在广东还是感觉到是中国是最自由的地方，在这里公民常常会有一点点机会维护自己的权力，我不敢说很多。上海是表面上感觉很自由的地方，但政府的命令公民是没有任何权利拒绝的。还是广东多年来受香港文化影响，有一种一体性。

我刚从北方来这里读书时，觉得这里的人不好理解。因为这里有很多人每天在街上喝茶，不用上班。有时候到处逛，有时候养鸟。后来听说这些人不用打工的，他有「海外关系」，即这些人坐住在这里，但有亲戚朋友在美国、香港、南洋，他就不靠这里的工资了。那个时候有「海外关系」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大陆，有「海外关系」的人从政治上就很被动。在这里，有「海外关系」就是有钱，吃饭不用担心。在这里，作为广州的市民，他们对北方文化不太有兴趣。比如在这里人们是不太听或看央人民广播电台或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他们只听香港电台、看香港电视。造成在广东的居民，他的注意力是在香港。我刚来的时候觉得不太适应，后来慢慢便习惯了。

问：北方的严肃学术文化跟广东的流行大众文化是怎样同时影响您的？

坦：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文化上开放，必然就有西方的思想，即所谓的学术成就进入我们的社会。而生活这种方式的开放，所谓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像香港这种现代生活方式，我们有一个很直观的体会。比如那个时候很流行的，每个人都要买一个卡式录音机。卡式录音机你是要买走私的，那个走私的你还要问他双声道还是四声道，是两个喇叭还是四个喇叭，是买回来可以放邓丽君的。那个东西叫「三洋牌」。后来我回北方，带一个机器回去，北方人却不知道邓丽君，他们以为这个机器叫邓丽君，或者那个唱歌的叫三洋，因为这个是一个事情。证明这种生活方式是从这里开始，再影响到内地的。

学术方面的影响，却确实没有从香港学者那边过来，倒是从中国的学者直接从西方翻译过来的。两个方面同时影响，还是比较完善的。以前北方谈论很多哲学思想，但是他们对所谓的自由、民主，或者消费，他们是没有任何概念，脑子里只有海德格尔怎么说自由。但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样的书，觉得这样的学者很可笑。因为他生活在一个跟现代生活根本无关的环境内，但要谈现代的学术问题。

所以我觉得在广东，无论如何，是最早接触到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从香港过来的，各位的消费品，比如那时候除了「三洋牌」外，还有一个太阳镜，当时是从香港带过来。那个太阳镜是在美国的一部电影，叫《大西洋来的人》，那个人在海里游泳，戴了一个黑眼镜，那个人叫Mick，那么这个眼镜拿到大陆去卖就叫米克镜，这个米克镜不知是从哪个港口运过来的。走私的。

西方理论、展览、杂志

(场景：天台)

问：刚才说过很有趣的，八十年代初是看文学，后来才转而关注哲学，这是怎样发生的？

坦：我觉得文学性的东西一开始是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文学有很多属于人的感性，更多表达知觉方面东西。哲学相对来说，它需要更多概念性的东西。但是我相信西方的现代文学和西方的现代哲学进来中国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只是对我个人来讲是经过文学对西方文化有一个很朦胧的了解，然后再对哲学感兴趣。

问：你提到波普尔，他对你的影响是怎样的？

坦：波普尔的书我没有看了很多，看了一点点吧，看了两本，但大家谈论他是非常多的，跟这些学习理论的研究生谈论得比较多。因为我觉得在广东这里从事艺术理论工作的人，他们受到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影响大，这一点也是跟贡布里希在中国影响大也有关系。到今天为止我还是觉得当初广东的从事艺术创作总是和这种实证精神(相连)。

当时中国的环境里有很多文化性的东西，而广东这边所谓的革命精神都是从现实社会的实际生存经验来研究和表达。大家一直是强调，我们不要说太多不能被实证的东西。要强调如果是一些说不清楚的形而上的东西，你就应该保持沉默，不要谈一些很大但是不着边际的一些文化问题，而应对现实社会作出实证性的分析和研究。那么刚好实证主义和波普尔的学说都对我们这方面有一点帮助。

问：一九八零年「星星画会」的展览是否来过广州？

坦：有看。八零年我看了有印象的倒不是「星星画会」，而是跟「星星画会」有关的一个展览，叫「北京现代油画会」的。而且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重要艺术家都跟「星星画会」有关，像冯国东这样的画家。这个画展影响挺大，我到现在还记得里面的一些画。有很多对绘画形式及绘画表达方面的探索。

问：这跟「星星画会」的展览是一起来的吧？

坦：事实上我对「星星画会」那个展览没有印象了，只对「北京油画展」有印象，这个展览与「星星画会」有关，而「星星画会」的展览我不记得了。不知道说的是不是同一个。

问：除此之外，有没有在中国其他地方看展览？

坦：中国人的做的艺术展览我看得不多，在八十年代头几年看了一些西方的展览，对我们有些影响。比如说有一个罗浮宫的展览在上海，还有一个美国的展览，但是我们没有看，但有图录。因为广东比较远，它与中国内地的文化潮流有一些距离，里面有些活动我们不能参加，太远了我们去不了。(19:47)

问：你自己到过的有哪些？

坦：罗浮宫的那个我看过。七八年，在我上美术学院以前，我在上海看过一个法国农村画展，这个法国农村画展里有印象派，有莫奈，甚至还有法国的野兽派。就是有一些法国三、四十年代一些相当现代的画。另外在一九八一年有一个《德国表现主义》展，很重要的，我们的同学都到北京看了。

问：是一九八一年吧？

坦：对，好像是。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去了，在中国美术馆。

问：到北京有没有认识到当地的年青艺术家？

坦：很少。我现在不记得了，那个表现主义的展览不知是八一年还是八二年了，也有可能是八一年。我们广州美院受表现主义的影响很大，我们广州美院不光是我，我们上面的一些同学都受表现主义的影响比较大。

问：这种影响维持了多久？

坦：我估计是到了九十年代。有些艺术家开始做概念艺术，这个时候表现主义的影响才比较弱。

问：那是影响了整个八十年代。

坦：这是南方的特色，在浙江影响的可能是概念艺术。

问：当时浙江发生的事情您都知道？

坦：「八五新潮」之后就知浙江那边发生的事情有些不一样。

问：有没有在了解他们的东西以后跟他们交流？或者有没有受他们的影响？

坦：当时好像是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当时很多影响都是直接从西方来的吧。当时我看的书，八十年代读研究生，都是从国外的书、杂志来的看。在国内的互相影响要比较少一些。

问：当时有什么外国杂志？

坦：八十年代可以看到《Art in America》和《Art News》；九十年代有法国的《Art Press》、《Flash Art》、德国的《Kunstforum International》，九十年代中有美国的《Art Forum》这样。最早是《Art in America》和《Art News》，那是八十年代一开始就有了。

问：就是通过这些杂志了解当代艺术吧。

坦：对，我想我起码是这样的。我当老师是每个星期带学生看两次这些杂志，在图书馆里上课。

从平面到装置艺术

问：八十年代已经知道一些概念艺术家，像波依斯吗？

坦：波依斯我们应该是到了九十年代才知道。八十年代更多知道是绘画方面的艺术，就包括表现主义。当时也刚刚知道杜尚，但八十年代基本知道包括新表现主义的艺术，如Max Beckmann，一个德国艺术家，住在美国的，还有德国的Baselitz及Anselm Kiefer等。那个时候就开始更关注概念艺术，因为通过新表现主义，肯定会涉及观念艺术这样的，到八十年代的后几年开始关心观念艺术，然后到了九十年代「大尾象」基本上就在这个方面工作了。应该说读研究生那几年，就是八六到八九年间，这几年做了很多准备，经过了从表现主义，当时还学习过美国的行动绘画，像De Kooning及Pollock这样。像这样的艺术都认真学习过。在这个以后才开始注意波依斯。

问：八十年代主要还是从事绘画吧。

坦：对，直到八十年代最后两年才开始这种转换吧。

问：当时知不知道「装置艺术」这种概念？

坦：那个时候知道，但是不是很明白。在《美国艺术》上经常会看到装置艺术。那时也多多少少有人来做讲座，其间经常会谈到这个。

问：但是没想到要做这个事情？

坦：因为觉得兴趣还是在画画的观念。怎么在绘画上表达一个观念。到了八十年代末、快到九十年代时，我画画开始做拼贴，就是把真的东西往上贴，就贴得很大了，把一颗树都往上贴了。这个时候就觉得这画已经装不下了。我试把一颗树、把一个真的火腿贴上去，火腿很快便坏掉了。后来慢慢你就发现这东西不能体现这观念，这观念一开始还是怎样在平面上表达一个概念。

八十年代末开始的这种拼贴，（最后发展成）我最早做的装置，即使前面已经有很多东西了，背后还是有一些画作为背景，九二年做的装置还是有画在背后。真正脱离这个背景是到了九六年，整个九十年代初的作品都是有背景的，这个背景要不是画、要不就是投影，像幻灯片投影或Video。真正让我觉得不需要这个是九十年代后半段了。所以看我的工作是一直从平面慢慢发展成拼贴，然后拼贴愈来愈厚、空间愈来愈深，慢慢离开了画，到做装置也有背景，到最后不需要。

现代艺术讲座

问：刚才提到一些讲座，记得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吗？

坦：广州美院的讲座一直不是特别多。最早一个印象比较深的是科恩夫人(Joan Lebold Cohen)，即Ethan Cohen的妈妈。她写过关于中国现代艺术的一本书。她来是讲纽约的现代艺术。她跟我讲，这个现代艺术每天都在变化的，她说下星期我回去，情况便可能不一样了，这很像现在的中国，反倒不像现在的纽约了。她这样讲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价值观念上的变化。就是艺术这样变，应该怎么来把握它，下星期都已经不一样了。广州美院的讲座一直也不是很多，但后来一直还是有一点。

问：这种讲座影响大吗？参加的学生会不会很多？

坦：很多，几百人的会议厅是可以坐满的。我不知道每个人听了有什么结果，反正对我是很有影响的。

问：有没有到过中国的其他地方参加讲座？

坦：到别的地方参加讲座没有。

问：因为陈侗上次说他到过北京参加一个「中西文化研究班」。

坦：那可能他参加过，我在八十年代期间好像没有的。

南方艺术家沙龙

问：有没有参加「南方艺术家沙龙」的活动？

坦：应该我没有参加他们的活动，我只是去看。因为他们开始活动时我不在广东，我从广州美院本科毕业了以后回到武汉三年，后来回来后他们已经在做了，我只是观众而已，但由于我跟他们关系比较密切，是朋友，跟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吧，像跟黄小鹏、陈劭雄、王度经常会谈起这个事情。

问：有参加过他们的讨论会吗？

坦：参加过一次。

问：当时对于他们办的活动有什么感想？

坦：当时还是觉得挺好的，当时觉得很解放。因为当时我们都还在画画，只是觉得(第一回实验展的演出)稍为太像舞蹈，像现代舞。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看了卢西·史密斯及阿纳森的书，那个书里面提过Performance Art里的Happening，(第一回实验展的)就不是Happening，因为Happening强调的是偶发性，而它这个是排练好的，我当时觉得很解放。从这一点上来讲是觉得不一样了。

武汉与广东

问：您本科毕业后回到武汉，那里的现代艺术情况怎样？

坦：有的，当时武汉有点热闹。八五年有「八五新潮」，实际上最热闹是到了八六年了，我也正准备要过来(广州)。在武汉做的虽然是现代、新潮，但我感觉好像不是我很想要的那种，我也搞现代，但不是这种，可能武汉的团体性比较强，社会比较紧密，广东这边比较自由，所以当时我准备回这边。总的来说武汉的好处是思想还是很激进的，武汉人比较有想法，不像其他某些城市的人对现代没什么兴趣，武汉人的思想还是比较时尚，对现代的思想还是跟得比较紧。

问：当时在武汉比较活跃的具体有什么人物？

坦: 都是湖北美术学院的人，像皮道坚、尚扬、李邦耀、杨国辛等当时都在武汉。

问: 后来回来是不想待在武汉吗？

坦: 我觉得广东的整个气氛、环境还是最适合我，是我想要的。

问: 为什么这样说？

坦: 我刚才已经说了，在北方谈现代性、现代思想时常常是一种很学术的态度，不一定有具体的生活经验。我觉得现代性一定跟商业生活、消费生活、市场有一个体验，才能够谈的。所以在广东，因为受到香港的生活、消费文化的影响，其中的连系很密切。所以在这里谈的现代性，我觉得是更真实的一种东西，和纯粹理论上的现代主义我觉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又有理念，又有一个真实的生活环境。所以我觉得广东比较好。

问: 当时有没有写过一些艺术家宣言？

坦: 没有写过。我们不喜欢宣言。一写宣言便很容易像王广义他们写的「北方群体」，什么寻求大的文化、人的什么关怀、大的基督教精神，这个正好是在刚才说波普尔和实证主义中要批判的。从前中国文化中太多像「天人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在艺术中大量使用的词汇，都是我们在广东很反感的。讲什么大的文化、大的基督教文化、大的宽容，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跟现代性没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在这里的实际生活中、在具体事件里体现一个现代思想，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个时候是很不喜欢这种宣言。武汉在整个文化上还是离北京比较近，当初是这样，后来又不一样了。武汉是比较中间，受各个方面的影响还是很多。

总结

问: 能否总结一下八十年代的文化艺术气氛？

坦: 我觉得八十年代是非常有意思的年代，它比起现在它是刚刚要开放，在整个中国的环境很多观念当时还是旧的，但是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改革的力量，要改变，这股力量好像把房子关了很久，把窗子一打开一阵很新鲜的空气。就是大家都觉得研究、学习、改变自己很重要。所以我们当时作为学生在学校里，经常是站在教授的反面的，就是不怕教授的批评，你愈批评我，我便觉得我愈好。但是现在我在这个学校里，我不知道学生会想什么，我甚至觉得在这个时候学习什么是不太重要，学习什么都是为了职业。

八十年代你学习艺术，是因为你觉得艺术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是非常有活力的时代，很多东西、很多观念的形成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特别是对社会很多问题的改善都是那个时候开始的。我在美国碰到一些人，美国人老是认为六、七十年代有意思，越战的时候。那肯定对美国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打仗嘛，肯定是八、九十年代经济更好，但很多人认为在文化上特别有意思，我估计是因为社会上有一股力量在改变它，有一种活力。这种活力在今天的中国，我觉得是反而比较弱化。

八九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因为八九之前的大学生与现在大学生的精神状况是绝然不一样的。那个时候，在八六年也有学生闹事，为了追求民主、自由、独立这些想法，八九以后这些都不存在了，今天的人更多是强调怎样能生活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也不是一个精神的概念，而是怎么生活得更滋润、物质生活得更好，将来有更好的职业，而是更少的关心社会。八十年代关心文化、关心社会是一个时尚。当时是如果这个学生他画画画得好，他是个才子、天才、深刻，那会有很多人崇拜他的。我现在说给学生听，跟这里年青的老师、我很好的年青朋友说，说那个时候谁画画画得好，很有哲学、很有思想，同学都很崇拜他。她会奇怪怎么会这样的，现在是不会的。那个时候你在学术等各个方面好是得到认可的，这说明了社会还是需要进步，要知识的一个年代。文化上是这样的。到了经济、法律等各方面到了今天发展得比较完善，大家可以看到八九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候。那个时间的文化与人的精神状况(跟现在)完全是两样的。

问：当时有没有看中国的美术杂志？

坦：有看的。有一本叫《艺术研究》，其中偶尔会有一两篇关于西方当代文化艺术的文章，但是总的来讲这些刊物看得不是很多。国内刊物看得不是很多，看得多还是国外的刊物。

问：中国批评家写了很多重要的文章，对你有没有影响？

坦：其实影响很少，因为八五思潮的时候我没有怎么参与，他们的文章在这边流传不广泛。他们真正影响大是到了九十年代才在广东影响大，因为我们成立了「大尾象」以后，跟北方有了一个对话。以前在八十年代广东的当代艺术是没有的，根本谈不上一个对话与交流。到了九二年，从湖南来的画家、批评家都认为广东是文化的沙漠、艺术的沙漠，他们认为广东更没有艺术家。那只是了九二年以后，在「大尾象工作组」成立以后，我才再没有听到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在八十年代这是基本的概念，即使有「南方艺术家沙龙」，北方人还是认为这里是艺术、文化的沙漠。他们也这样看香港，对整个粤语区都这样看，到现在我估计他们不会这样看了。

问：在武汉的三年期间跟在广东的朋友有没有保持联系？

坦：有联系。联系得不太多。广东那个时候有一个沙龙，但陈侗好像不在广东，杨诒苍与侯瀚如在这里做了一点事，但没有太多沟通，真正的沟通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才有。

问：当时有没有试过偷书？

坦：没有偷过书，但有在图书馆借了书不还，是因为我被美院开除之后心里比较郁闷，觉得这书对他们来讲没有用，对我才有用。

问：邵宏老师说美院图书馆有很多学生撕书。

坦：对，把好的页割下来。

问：您有没有做过？

坦：我没有做过，好像不记得有做过，应该是没有做过...